

现当代史学史视野下的李大钊史学论著

邹兆辰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037)

摘要:对于李大钊有关史学方面的论著,包括著作、文章、讲义等,应该放在现当代史学史的视角下来考察,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学术背景、思想内容、社会影响等,了解其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并从历史的角度认识它在当代史学中的价值。对于过去及现今种种质疑的某些论点做出必要的回答。要学习李大钊重视历史教育的精神,专业史学家也应写出雅俗共赏的史学作品。

关键词:史学史;李大钊;史学要论;史学论著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349X(2017)04-0024-08

DOI:10.16160/j.cnki.tsxyxb.2017.04.004

On Li Dazhao's Historical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ZOU Zhao-che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Li Dazhao's history works, including books, articles, lectures etc., should be stud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It is essential to analyze their social background, academic background, ideological content, social influence, complicated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modern historical valu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It is also necessary for historians to clear up various doubts about them, learn the spirit of Li Dazhao's historical education, and write both refined and popular historical works.

Key Words: historiography; Li Dazhao; *Introduction to Historical Theory*; historical works

李大钊同志殉难已经 90 年了,而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主张运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促进历史学的科学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则接近了一百年。抚今追昔,我们看到当年李大钊同志有关历史、有关历史观、有关历史学科建设方面所做的开创性的思考和积极的实践,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黯然失色。相反,他的诸多精辟的思考、见解和主张在一个世纪的时光的磨洗下,反而显得熠熠生辉。它在不断地启迪人们的心

智,开拓人们的视野,促进人们新的思考。他在史学方面的遗著,今天已经成为现代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本文的宗旨,即是以现当代史学史的视野来考察李大钊的史学论著在百年来的不同历史时期的际遇,追寻其发展的趋势,并对其中所遇到的一些症结,略陈个人的一些见解。

自 1920 年起,李大钊就在北京大学开设了唯物史观的课程。主要的题目有:“唯物史观在

作者简介:邹兆辰(1940—),男,福建福州人,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

现代史学上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史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原人社会于文字书契上的唯物的反映”“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之特点”等。他的史学思想史课程中包括的题目有:“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鲁雷的历史思想”“孟德斯鸠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孔道西的历史观”“桑西门的历史观”“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是1924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百科小丛书》的第51种。在这本小册子中共讲了六个问题: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历史学的系统,史学在科学中的位置,史学与其相关学问的关系,现代史学的研究及于人生态度的影响。此外,李大钊还有一些史学的文章流传于世,如《“五一”(May Day)运动史》《工人国际运动略史》《马克思与第一国际》《大英帝国侵略中国史》《从印度航路发见以至〈辛丑条约〉帝国主义侵入东方大势年表》《孙中山先生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等。

李大钊的史学论著在九十多年的现当代史学史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他的这些论著的价值判断经历了两次高潮。

一、第一次高潮:20世纪30年代——多元思潮下的价值判断

二十世纪最初的二三十年,正是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新史学思潮开始兴起,史学家们开始试图用新思想、新理论、新观点来研究和说明中国历史的时期。如夏曾佑出版了以新史学理论为指导的《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章太炎和梁启超也在思考按照自己的观点和方法,撰写新体例的中国通史。围绕着什么是历史,什么是历史学,怎样研究历史,怎样编纂历史著作,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历史学的功用,历史学的特性等问题,当时的史学工作者或者是译介或者是独立编撰了各种综合性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论方面的著作。如1902年就有汪荣宝编译的《史学概论》、邓实的

《史学通论》问世,1922年梁启超撰写《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年又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7年何炳松的《历史研究法》相继问世。同时,国外的同类著作的译本也开始出现,如日本浮田和民的《史学原论》、美国鲁滨孙的《新史学》、法国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等。在这样一个渗透着新史学思想的综合性史学理论和方法论著作纷纷出版的潮流中,李大钊推出了吸收借鉴诸家说法、并经过自己慎重思考且带有自己特色的《史学要论》。

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出版以后,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代学者周文玖指出:“李大钊的史学观念对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大量的史学理论著作中,大都包含史学史的内容,刘剑横的《历史学ABC》(1932年版),周容的《史学通论》(1933年版),刘静白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1933年版),李则刚的《史学通论》(1935年版)等,都明显地接受和运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应该说,他们都是属于李大钊学术系谱的学者。”^{[1]114}他指出,这几部著作在给历史、历史学下定义的时候,大都引用并赞同李大钊的观点。

刘静白1933年出版的《何炳松历史学批判》中说:“李守常到底是新—世纪的人,而且又受过进步思想的熏陶,所以在各方面都表现出优越性来。”他解说“什么是历史”就站在变动的过程上将人类历史与社会统一起来,认为“历史就是整个的人类生活,就是整个底社会变革”;并且再三说明“活的历史,是进展的行動的东西”。他说历史肯定地说是历史科学,亦可称为历史理论,“这和记述底历史须得划分的,且以记述历史之成果为起点研究”,“且示之以规律,俾有所准绳”。更于这种理论研究上开初组织了历史学系统。又于“普通的历史”之外,用“特殊的历史”一词包容整个的人文科学(或文化科学)的理论与记述部分于历史学之中。这些意见容或有商量的余地,但他这种立于理论研究意味上的这种精神的试探,把历史学高调起来,确是值得我们注意。最后提及史学研究及于人

生态度的影响,更是一个革命家的信号,只有阶级觉悟了的人才能接受的。

李大钊关于历史、关于历史学和史学思想史的一系列著作,体现了他接受唯物史观以后所秉持的一种积极进取、乐观向上的历史观,也受到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高度关注和赞赏。郭湛波 1936 年出版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引用了李大钊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文章阐述的观点之后,认为这是他的新史观的方法,一是历史的现象是变易的、连贯的;一是观察历史要得到全部的真相。因为宇宙一切的事物,都是相关、联系的、整个的,所以从全部观察,才得到事物的真相。这种新历史方法当然和旧历史方法不同。郭湛波认为,由于新旧历史方法的不同,所以,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不同。他还认为,李大钊的新历史观,同他的宇宙观、人生观是一贯的思想,都是他的根本观念。这种历史观非常重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有正确的人生观,才有正确的对历史的解释。现代史学者的责任,要根据这新史观、新史料,把旧历史一一改作。郭湛波认为,李大钊的新史观是从唯物史观脱胎而出的,也可以说是他对唯物史观的应用、了解。同时,李大钊还特别强调唯物史观不是机械的唯物论,而是辩证的唯物论。因此,郭湛波称赞李大钊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流的思想家”^[2]。

在 20 世纪的上半叶,正是各种思潮、流派竞相传入中国的时期,不同流派的思想家都希望以自己所认同的理论、观点认识历史,并建立自己的历史学话语体系。李大钊当时力图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历史与社会,也遭到了不同学术观点的质疑。朱谦之在《历史哲学大纲》中强调应承认社会学与历史学“同出一源”。他批评当时的新史学家,如何炳松、梁启超都强调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甚至认为李大钊对历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也是不彻底的。他说:“固然如李守常著《史学要论》(《百科小丛书》第五十一种,此书本于内田银藏的《史学理论》之处甚多,似非代表之著作),似乎要在此类历史的‘浑论’以外,另找真实的历史、生活的历史,所以说‘横

着去看人类,便是社会,纵着去看人类,便是历史’;‘历史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纵起来研究的学问,社会学是把人类社会的生活横起来研究的学问’。但他仍然始终认为二者之间有些不同,终以为不可认作全为同物。”认为是一种“不澈底的论潮”^[3]。

朱谦之在《现代史学概论》中谈到史学与哲学的关系,认为“以李守常代表的马克思派,则在他所著《史学要论》的小册子(《百科小丛书》第五十一种)中,全书只八十八页,竟有三十页讨论到历史哲学。他书中大部分依据于内田银藏《史学理论》一书,自不算是他的创见;里面列入‘史学与哲学的关系’也是照抄,而未曾加以申明的”^[4]。关于朱谦之所说,《史学要论》本于日本学者内田银藏的《史学理论》问题,我们将在下边讨论。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正是国内、国外各种学术思潮在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互相争胜的时代,史学领域中的唯物史观派也是当时的新史学思潮中的最有影响力的学派。自它诞生起就是在各种不同思潮的交流论辩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这是时代思潮的特点所决定的,也是不足为怪的。

二、第二次高潮: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形势下的学术认同

20 世纪 40 年代,是全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内革命战争的时期,关于历史学科的建设也有一些成果,但相对数量较少。20 世纪 50 至 70 年代,在历史学领域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占据了主导地位。史学工作者学习唯物史观,力图运用它来研究历史、解释历史,在研究过程中,对一系列历史理论的问题展开了讨论,学术气氛相当活跃。十年动乱期间,正常的学术讨论的氛围遭到破坏,许多历史理论问题的讨论被迫中止。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史学工作者才开始反思,几十年来史学理论学科的建设被忽视,人们似乎忘记了在探讨研究客观的历史问题的历史理论之外,还需要考虑到历史学自身理论的建设,需要建设一门科学的历史学理论体系。这时候,李大钊的《史学要论》被重新提及,并且迅速地得到史学理论工

作者的关注。

叶桂生的《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国史研究》1979年第4期)、皮明麻的《李大钊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79年第4期)、李润苍的《李大钊同志对中国史学的贡献》(《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4期)、王关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李大钊》(《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等文章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关于李大钊史学研究的新起点。

1982年,白寿彝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的讲话中提到对李大钊史学著作的评价。他认为李大钊对于马克思主义在史学领域的传播是很有贡献的。可以说,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第一个奠基人。李大钊写了不少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文章。他在1920年所写的《史学思想史讲义》里,指出历史跟历史资料的区别。李大钊在这时候就已有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旧史学的思想。他对于旧史学的批评,是击中了要害的。1924年,他出版了《史学要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书。这本书把客观存在的历史跟人们的历史记载分开。这对于当时的旧史学界把历史文献看作历史本身,是一个深刻的、很确切的批判。他在这本书里高度评价史学对思想教育的重要意义,强调史学的重要作用在于指示社会前进的正确道路,他说:“我们登这过去的崇楼登的愈高,愈能把未来人生的光景及其道路,认识的愈清。”李大钊同志对于史学的崇高的期望,使我们今天读着他的遗著,还觉汗颜^[5]。

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史学界形成了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和李大钊史学论著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地位的认可的高潮。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方面,新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学史著作重新认定李大钊对史学贡献的重要地位。

尹达主编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在“唯物史观的传播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萌芽”一章中将“李大钊对现代史学的贡献”列为一节进行论述。文中指出:“二十年代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

史学的萌芽时期。在这一时期,真正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改造中国传统史学,并作了突出贡献的,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李大钊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已经运用唯物史观的原理去分析中国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某些问题,发表不少精辟的见解,显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新史学家的思想能力。这些著作,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萌芽时期的珍贵遗产,在现代史学史上光彩熠熠。”文章分析了《史学要论》的内容后指出:“李大钊关于改革旧史学、创造新史学的主张,指明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前进的方向,在现代历史学上,有着划时代的指导意义。”^[6]

白寿彝主编的《中国史学史教本》中,以专章讲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其中以专题来谈“李大钊的贡献”。书中指出:李大钊在他的论著中,第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第二,指出了唯物史观对于史学和人生的重要意义;第三,李大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论。可以认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写成的史学概论。书中指出:“李大钊在史学上虽没有鸿篇巨制,他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也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所开辟的道路是广阔的,所指示的方向是正确的。”^[7]

第二方面,李大钊关于历史观、历史学等方面的论述,得到了当代史学工作者的认可,在80年代以后出现的史学概论编撰的热潮中,李大钊的学术观点被大量引用。

山东大学历史系和云南大学历史系共同编写的《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教材,书中讲唯物史观是唯一科学的历史观时用了很大篇幅讲述李大钊的贡献。书中指出,《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概论。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见解,明确了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历史研究的任务,论证了历史研究的目的,讲出了历史研究的特点,而且提出了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许多方法论问题。同时书中指出,

李大钊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立上,有开创之功。他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他所指明的治史方向,直到今天仍不失其价值。

1983年,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正式出版。书中设专章讲述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指出李大钊同志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学要论》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跟一些具体的史学工作相结合的著作,是为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开辟道路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史学概论》出版于2009年,由这个领域的著名专家编写而成,是新时期以来史学概论教材中出版最晚的一部。对李大钊《史学要论》依然十分重视,指出,1924年,李大钊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对史学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学科体系认识的奠基之作。此外,该书还特别指出:李大钊的史学观以及他所提出的这一历史学的学科体系,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产生的影响尤为突出。

当时面世的一些史学概论教材对《史学要论》的主要观点作了阐发。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开宗明义讲“什么是历史”时说:“历史这样东西,是人类生活的行程,是人类生活的联续,是人类生活的变迁,是人类生活的传演,是有生命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进步的东西,是发展的东西,是周流变动的东西。他不是些陈编,不是些故纸,不是僵石,不是枯骨,不是死的东西,不是印成呆板的东西。我们所研究的,应该是活的历史,不是死的历史,活的历史,只能在人的生活里取得,不能在故纸堆里去寻。”^[8]

李大钊上述对什么是历史的论述成为一段经典论述,为多种史学概论所征引。如葛懋春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杜经国等主编的《历史学概论》、庞卓恒主编的《史学概论》、姜义华等主编的《史学导论》、马工程《史学概论》编写组的《史学概论》教材等。以上事实说明,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重新编撰史学概论教材的过程

中,才真正认识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在中国马克思史学中的地位及其在史学史上的价值,当年李大钊对有关历史、历史学的一系列论述,即使在今天的史学理论的论著中仍然熠熠生辉。

第三方面,李大钊的史学论著以及这些论著中反映出来的史学思想,正在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对李大钊史学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

如果说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对李大钊史学著作高度认同的潮流主要是在宣传、介绍的层次,到90年代以后就逐渐形成了对李大钊史学著述和史学思想的研究,而且研究的深度在逐步加强。有学者统计,截止到新世纪初年,有关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已经有六七十篇,专著有七八部。这些研究涉及以下方面。

一是关于李大钊与中国史学的研究。吴汉全的《李大钊与现代中国学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一书,对于李大钊关于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美学、图书馆学、新闻学等方面的思想和贡献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其中,以一章的篇幅系统地论述了李大钊对开创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贡献。

张越著的《新旧中西之间——五四时期的中国史学》(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出版)以一节篇幅讲“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作者从五四时期的特定角度出发,对李大钊在这一时期的史学活动进行了全面的考察。指出李大钊不仅是五四时期唯物史观的最积极的宣传者,而且也是当时认识、了解唯物史观最深入的马克思主义者。《史学要论》是最全面、最系统地反映他的史学思想的著述。它不仅在当时引进西学的大潮中独树一帜,而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和日后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

二是关于李大钊历史观(历史哲学)的研究。晋荣东的《李大钊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研究的李大钊哲学主要是李大钊的历史观,也就是对于他的历史本

体论方面的研究,如李大钊关于历史与哲学、历史的进步与动力、历史规律和人的活动、个体与群体之辨等方面的内容。

三是关于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吴怀祺是从史学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一位学者。在其所著《中国史学思想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中认为,史学思想史这门学科,无论是对于史学史的建设,还是对人们认识史学发展的前途、看清思想发展的趋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史学思想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始自李大钊。他着重研究的是欧洲的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但其中也包含了对中国史学思想史的思考,特别是对中世纪中国的神学史观、循环史观、倒退史观做的批判相当深刻,阐明了史学发展与史学思想进步的密切的关系。

张艳国在《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研究析论——本世纪2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研究之一》(《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一文中,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李小树于1996年至2004年,连续发表7篇关于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的文章,其中《李大钊史学理论蕴含的几个观念——纪念〈史学要论〉问世80周年》(《史学理论研究》2004年第3期),是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的一篇颇有分量的文章。

四是关于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邹兆辰的《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研究》1992年第1期)和《五四时期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评价》(《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对该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侯且岸的《李大钊与西方历史哲学》(《北京党史》1999年第6期)和《李大钊历史思想述论》(《史学理论研究》2000年第4期),《李大钊对西方史学思想的借鉴》(《中州学刊》2001年第1期)都涉及到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洪认清的《中国史学思想通史·近代后卷》(黄山书社,2002年出版)一书指出:李大钊在20年代,由学习和研究西方资产阶级历史哲学,转而学习、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因此他以

史学思想史研究见长,其史学思想史又侧重在西方史学思想方面。

五是关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的体系与价值的研究。对于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史学界研究的文章很多。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出版《20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时,《史学要论》被列入,瞿林东专门撰写了《李大钊与〈史学要论〉》一文,对《史学要论》在20世纪史学中的地位作了评价。他认为通观李大钊的论著,有两个方面的特点是应该受到重视的。第一,李大钊的思想、理论往往是通过历史和对史学的阐发而表现出来的;第二,李大钊“夙研史学”,在史学方面不仅有兴趣,而且有造诣。《史学要论》一书,则是一本可贵的系统论著。这两个方面的原因,确立了李大钊在20世纪中国史学上的重要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认为《史学要论》是李大钊系统地阐述他的史学思想的一部精粹之作,全书六章结构严谨,言简意赅,具有理论的深刻与实践的激情相结合的特点。《史学要论》是第一部从理论上开辟道路的著作,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理论上的奠基石。书中反映出作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信念,对于史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分析,对于史学之影响到社会、人生的关注等,今天读来,仍使人感觉到它的巨大的理性力量和深沉的激情涌动^[1]。

此外,周文玖也曾专门撰文论述李大钊的《史学要论》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在《史学史导论》一书中,他专门论述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贡献及史学思想史研究,其中很大的篇幅是讲《史学要论》的理论贡献的^[9]。

进入21世纪,李大钊的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总结新时期以来史学界对李大钊的史学实践活动和对李大钊的史学思想进行全面研究的学术成果,应属张文生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出版)。作者认为:李大钊史学思想内容精深,体系完整,全面涉及了史学理论的问题。他从李大钊的历史论、史学论、历史认识论和史学方法论四个方面,对李大钊史

学思想进行具体而深入的研究。作者指出,李大钊及其史学思想在中国史学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影响,该书就此展开了评析性的研究和论述。此书的出版,标志着李大钊史学思想的研究达到了新的高度^[10]。

三、关于深化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的几点思考

李大钊宣传唯物史观并且力图用唯物史观来建立新的历史学理论体系,改造旧史学,创新新史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学术界对李大钊的史学活动和史学思想的研究也有几十年的历史了。李大钊的史学实践活动以及在文字上的遗产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章。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工作者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今后如何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笔者这里提出几点想法,以供学界同仁参考。

第一,加强李大钊史学著述、史学思想的探源研究。从 1979 年至今,史学工作者对于李大钊的史学著述、史学思想做了大量的宣传、介绍的工作,对李大钊的著述在文本上的分析、研究也已经取得许多成果,当然也有一些问题没研究到或者研究得不够深入。今天,我们需要突破文本本身的局限,进行一番李大钊学术思想的探源工作。作为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页,它必然会有其来源、参照、借鉴的东西,加上他个人的思考和研究,才形成他的诸多文字。在 20 世纪 30 年代,朱谦之等学者就已经先后提出《史学要论》一书本于内田银藏的《史学理论》之处甚多,那么我们就不应回避这个问题,具体分析一下《史学要论》究竟在哪些地方吸收、借鉴了内田银藏的书,这些吸收、借鉴对于《史学要论》究竟产生了什么影响。近日看到青年学者叶建的文章《李大钊〈史学要论〉与内田银藏〈历史理论〉的比较——澄清一桩史学公案》(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 年卷),这是在朱谦之提出这个问题之后六十多年首次回应这个问题。叶建在文章中具体分析了李大钊在哪些地方是借鉴、引入了内田银藏的论述。例如,在有关历史学的定义方面、史学体系的划

分方面、关于史学与其他学科关系方面的论述,都有与内田银藏的论述十分接近的地方。但叶建的文章也指出,两本书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例如,李大钊在《史学要论》中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历史学的若干问题,内田银藏的书中是没有的,李大钊对西方历史哲学的关注在内田银藏的书中是没有的,李大钊特别重视历史认识论的研究,而内田银藏的书中是没有的。叶建的文章还从两个人的历史观和史学理论的侧重点上,比较了他们史学思想的不同。此外,叶建还有一篇文章谈近代日本史学与李大钊的史学理论话语构建,更全面地探讨了李大钊的史学理论所受到的近代日本史学理论的影响。笔者认为,李大钊的史学理论的著述是在那个特定时代、特定的内外环境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自己的话语体系。实事求是地剖析他的思想理论的来源,并不会影响李大钊著述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反而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学风的体现。有条件做这方面探讨的学者应该继续这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史学要论》,在史学思想史的讲义中也是需要做这方面的探源工作的。

第二,深入研究李大钊史学思想各个方面,回答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李大钊的史学思想反映了一位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唯物史观的理论说明历史问题并构建新的历史学理论体系上的努力。在这方面自然有不成熟的地方。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单就史学思想而言,这里需要澄清的问题还有很多。我们以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许冠三先生写于上世纪 80 年代,2003 年在内地出版的《新史学三十年》,可以发现他对李大钊史学思想的分析有些地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

许先生认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中有一种“进理论退记述的偏爱,更导致他在史学界说上不断摇摆不定,甚至前后矛盾”^{[11]308}。笔者认为,对于这样的问题需要进行专门分析,理解李大钊强调史学理论重要性的意义,并且由此说明与历史学的基本概念是否存在矛盾。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的史学思想,特

别是他的史学思想中的一些有特殊意义的见解,直到今天还在遭到人们的误解,不进行深入细致、有针对性的研究,是很难说明问题的。

第三,呼唤21世纪的《史学要论》。李大钊的《史学要论》问世于1924年,距今将近百年。这本只有四万字的小册子,这本百科小丛书的一种,在今天被列为史学名著,在中国史学史上依然闪烁着它的光辉。今天,史学发展的状况已经是百年之前不可想象的,中外史学交流的情况也是过去无法想象的,特别是关于历史学的理论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展。21世纪的今天,我们是否需要借鉴李大钊的经验编写一本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史学要论呢?答案是肯定的。今天,从历史学专业教育出发的史学概论教材可以说层出不穷,但是既有专业水准,又具有个人风格,适合专业教育和一般群众阅读的史学概论则未曾见到。今天,社会上仍然有人分不清历史本身与历史著作的区别,他们可能认为某某人物的传记就是某某人物本身。有人更是不懂戏说的历史与真实历史的区别,以至戏说的历史泛滥、大有市场,而严肃的历史著作却少人问津。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不了解历史与现代社会及人生的关系,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被遗忘、被淡化。还有人以历史虚无主义抹黑百年以来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忘记了民族的历史,是十分可悲的。今天的历史学家,特别是史学大家,也应该像李大钊那样,除了进行专业研究和写

作外,也应热心于对民众的历史教育,撰写出适应时代需要又有个人风格的普及性的史学理论著作。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李大钊、纪念李大钊的题中之义。

参考文献:

- [1] 瞿林东. 20世纪中国史学散论[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
- [2] 郭湛波. 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25.
- [3] 朱谦之文集:第五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139.
- [4] 朱谦之文集:第六卷[M]. 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110.
- [5] 白寿彝史学论集:下[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640.
- [6] 尹达. 中国史学发展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486-491.
- [7] 白寿彝. 中国史学史教本[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433.
- [8] 李大钊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399.
- [9] 周文玖. 史学史导论[M]. 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 [10] 张文生. 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 [11] 许冠三. 新史学九十年[M]. 长沙:岳麓书社,2003.

(责任编辑:李亚平)